

大阪アジア主義の理想と現実

——1934年清水銀藏の中国旅行を中心に

劉 重 越

The ideal and reality of the Osaka Asianism

—— Shimizu Ginzō's trip to China in 1934

LIU Chongyue

After Naitō's death, the development of Orient Culture Alliance fell into a dilemma. For the future of the alliance, Shimizu Ginzō, one of the founders of the alliance, began an inspection tour in China. In this process, he met with Zheng Xiaoxu, Hu Shih, Jiang Menglin and Wu Tiecheng. After returning home, Shimizu sorted out the experience of this trip into an article manshisatukityōdan (滿支視察歸朝談) in the tōhōbunka renmeikaisi (東方文化聯盟會誌) No. 5. Taking this article as the core, the author tries to explore this important ev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riental Cultural Alliance by investigating and analyzing the process of Shimizu Ginzō's visit to China.

Keywords: Asianism ; Orient Culture Alliance ; Shimizu Ginzō

關鍵詞：亞洲主義；東方文化聯盟；清水銀藏

前言

東方文化聯盟是由清水銀藏（1879-1937）、內藤湖南（1866-1934）和佐多愛彥（1871-1950）等人牽頭組織，1931（昭和6）年12月10日在大阪俱樂部¹⁾成立的以關西地區為核心活動區域的民間亞洲主義團體，活躍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其宗旨是“同情印度反英鬥爭和中國統一運動，加強亞洲各民族之間的相互理解與親和團結，進而實現人種平等和共存共榮”。東方文化聯盟（以下略稱“聯盟”）主要由關西地區的工商界和新聞界人士組成，並輔以少量的政治家、學者和外國人士。主要成員有清水銀藏、內藤湖南、佐多愛彥、戶田芳助、岩井勝次郎、栗本勇之助、印度人拉希·比哈裏·鮑斯（Rash Behari Bose）和中

1) 位於大阪市中央區今橋4-4-11的大阪俱樂部作為會員制的社交俱樂部，1912（大正元）年由大阪的財經界人士創立。迄今已被持續利用百年以上。作為大阪三大名建築之一（另兩處為棉業會館和大阪煤氣大廈），1997年被指定為有形文化財。

國人殷汝耕等。發行有機關刊物《東方文化聯盟會誌》²⁾。

目前學界關於聯盟的研究不多。在著作方面，聯盟重要成員佐多愛彥的個人傳記《佐多愛彥先生傳》³⁾中開闢了專門的章節介紹聯盟。鈴木茂三郎的《財界人物評論》⁴⁾中提及聯盟在大阪財經界中的影響力非常大，“大部分公司的課長（部門主管）都是聯盟的成員”。⁵⁾此外，青江舜二郎的《亞洲人・內藤湖南》⁶⁾和《龍的星座—內藤湖南の亞洲生涯》⁷⁾中對聯盟的成立原因進行了探討。中島岳志的《中村屋の鮑斯—印度獨立運動和近代日本の亞洲主義》⁸⁾及鮑斯女兒樋口哲子的回憶錄《父親鮑斯—追憶中的亞洲和日本》⁹⁾則是聯盟重要成員印度人鮑斯的個人傳記，其中論及了鮑斯在關西地區活動的具體的情況。在論文方面，關西大學陶德民教授有兩篇論文《內藤湖南晚年的東方回歸及其含意：從〈新支那論〉到東方文化聯盟》¹⁰⁾和《內藤湖南和東方文化聯盟—昭和初期亞洲主義的一種形態》¹¹⁾。這兩篇論文都以內藤湖南為切入點，分別探討了內藤湖南晚年思想“回歸東方”的轉變和亞洲主義思想源流，以及聯盟成立的原因、過程和內藤在其中所產生的作用和影響。近年最新的研究成果要數大阪大學瀧口剛教授的《東方文化連盟——一九三〇年代大阪の亞洲主義》¹²⁾，這篇論文從政治學的視角探討了1930年代後期，聯盟是如何不可避免地從亞洲主義轉變為大亞洲主義。文中肯定了聯盟在早期發展過程中對亞洲主義所作出的貢獻，不過也指出在當時日本的社會大背景和大潮流下，聯盟必然無法做到獨善其身，在日中戰爭全面爆發（1937年）后，聯盟從亞洲主義團體逐漸轉變為大亞洲主義團體。

和興亞會、東亞同文會、玄洋社等著名的亞洲主義團體相比，不論規模、活動範圍還是知名度，東方文化聯盟都沒有上述的團體那麼大。作為一個主要活躍於大阪的地區性團體，由於擁有幾個有別於其他亞洲主義團體的特點，使聯盟在亞洲主義研究領域具有很大的研究意義和價值。聯盟的特點有三：一是主要成員由工商界和新聞界人士組成；二是注重日印關係，日中和日印雙線並行；三是遠離政治紛爭，幾無政治和軍方背景。這幾個特點決定了聯盟在近代日本諸多的亞洲主義團體中是一朵“奇葩”，特別是人員構成和注重日印關係這兩點，幾乎是日本亞洲主義團體中的唯一。

由於資料匱乏及收集困難，關於東方文化聯盟的研究在陶氏之後長期處於停滯不前的狀態，直至近年才有瀧口氏及筆者的研究成果問世。不可否認的是，聯盟在日本亞洲主義研究領域的地位遠不如東亞同文

2) 《東方文化聯盟會誌》共十九號，為半年刊，刊行時間從1932（昭和7）年至1941（昭和16）年。其中前兩號名為《東方文化聯盟會報》，從第三號開始改稱《東方文化聯盟會誌》。現一般將全部十九號通稱為《東方文化聯盟會誌》。

3) 高梨光司《佐多愛彥先生傳》（佐多愛彥先生古稀壽祝賀記念事業會、1940年）。

4) 鈴木茂三郎《財界人物評論》（改造社、1936年）。

5) 同注4、252-259頁。

6) 青江舜二郎《アジアびと・内藤湖南》（時事通信社、1971年）。

7) 青江舜二郎《龍の星座—内藤湖南のアジア生涯》（中公文庫、1980年）。

8) 中島岳志《中村屋のボース—インド獨立運動と近代日本のアジア主義》（白水社、2005年）。

9) 樋口哲子《父ボース—追憶のなかのアジアと日本》（白水Uボックス、2008年）。

10) 陶德民《內藤湖南晚年的東方回歸及其含意：從〈新支那論〉到東方文化聯盟》（臺北中央研究院“視域交會中的儒學：近代的發展”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2013年）。

11) 陶德民《內藤湖南と東方文化聯盟—昭和初期におけるアジア主義の一形態》（“関西大学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別冊”第三号、2008年）。

12) 瀧口剛《東方文化連盟——一九三〇年代大阪のアジア主義》（“阪大法学”第3・4号、卷69、2019年）、487-520頁。

會、玄洋社等著名團體，不過對聯盟的研究卻可以極大地豐富亞洲主義團體研究的多樣性，對不同風格和特點的亞洲主義團體的研究是對亞洲主義研究領域的一種非常有益的補充。

本文所研究的事件—1934年清水銀藏的中國旅行，目前為止沒有任何的先行研究提及此事，不過筆者在研究《會誌》後發現，1934年清水銀藏的中國旅行是聯盟發展史上的重要事件，非常具有研究價值和意義。在聯盟籌建的1930至1931年，內藤早已退休並隱居京都的瓶原村恭仁山莊，聯盟發起者清水銀藏“三顧茅廬”力邀其出山擔任聯盟理事一職，再加上佐多愛彥，三人組成了聯盟的“三駕馬車”。清水本人是政客，雖受犬養毅影響成為一名亞洲主義者，但並不具備成熟的亞洲主義思想體系，佐多作為知名的醫學家，亦是如此。因此內藤的思想在聯盟中就顯得尤為重要。雖然在聯盟成立之後，內藤由於身體原因，幾乎不參與理事會和具體的活動，但是他完全可以說是聯盟的“精神領袖”，聯盟的要旨乃至於“東方文化聯盟”這一個名字都是出自於內藤之手，可見他在聯盟內的重要地位和影響力。1934（昭和9）年6月26日內藤因病去世，自此聯盟失去了它的“引路人”，接下去聯盟的路怎樣走、如何發展，這都是擺在清水和佐多等人面前的實際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同年9月清水啟程前往中國，進行了一月有餘的考察活動，通過此次旅行，清水不僅為聯盟的對外發展開闢了道路，還從新厘清了聯盟將來的發展方向和方針。本文將以清水在歸國後發表的旅行回顧文章“滿支視察歸朝談”為核心，以他的中國旅行為切入點，探究這一對聯盟發展產生深遠影響的重大事件。

一 清水銀藏的三次中國之行

清水銀藏，號千裏，1879（明治12）年作為實業家清水彥次郎的次子生於大阪府大津市（現滋賀縣大津市）。1898（明治31）年從東京麻布中學畢業之後進入早稻田大學，四年後從英語政治科畢業。畢業後進入父親開設的愛國生命保險株式會社工作，期間歷經大阪、京都和名古屋支店長等職，並最終升任本社的總務部長。清水在1919（大正8）年辭職後，曾前往朝鮮、北滿和南支等地考察。

由於清水和犬養毅（1855-1932）私交甚篤，更一直以來是犬養的忠實門徒和盟友，因此在1919年從中國考察歸來之後加入了犬養所在的立憲國民黨，並擔任本部幹部。1922（大正11）年立憲國民黨解散後，犬養成立了革新俱樂部，之後和立憲政友會合流。在此期間清水一直跟隨犬養，進入立憲政友會任職，長期擔任立憲政友會滋賀縣支部長，並被推薦為本部顧問。1929（昭和4）年更是全程隨同犬養前往南京參加蔣介石為孫中山舉辦的“奉安大典”，此次中國之行也成為後來清水創建聯盟的誘因。此外，還擔任了1922年創刊的《江州日日新聞》（滋賀日日新聞前身，後併入京都新聞）的董事一職。在《大津市人物名鑑》中，清水被稱為“縣裏屈指可數的政治鬥士”¹³⁾。

清水一生曾先後三次前往中國，分別是在1919年、1929年和1934（昭和9）年。

清水第一次前往中國是在1919年。由於清水沒有回憶錄，也沒有日記留存於世，更沒有人為其著書立傳。因此關於他此次中國之行的資料甚少，僅在《大津市人物名鑑》中有一語而已。

13) 滋賀日出新聞社經濟部《大津市人物名鑑》（滋賀日出新聞社、1936年）、121頁。

嘗て日露戦争の直後朝鮮及び満洲の視察をなし、大正八年には北満、南支の視察を試み……¹⁴⁾

清水大學畢業后就一直想去中國旅行，但時值日俄戰爭爆發，東亞時局動蕩，去中國考察的計劃只得暫時擱淺。這一耽擱就是十五年，1919年在辭去保險公司的職務后，年屆不惑的清水才得以第一次前往中國。關於此次中國之行的具體經過和清水自身的感想，目前已不可察。

清水第二次前往中國則是在第一次的十年之後。1925（大正14）年3月12日孫中山去世，遺體暫厝北平（現北京市）西山碧雲寺。1929年南京中山陵落成竣工，蔣介石廣邀孫中山生前好友齊聚南京，於6月1日舉行“奉安大典”（移靈祭），按孫中山遺願將其安葬於南京紫金山下。孫中山在落難日本時，犬養曾給予他很多幫助，兩人也自此成爲好友。由於這層關係，犬養也接到邀請赴南京參會，而清水正是犬養的隨員之一。在“奉安大典”后，他還隨同犬養前往山東曲阜拜謁了孔廟。在這次中國之行中，清水聆聽了犬養的諸多發言，深受其亞洲主義思想的影響，在歸國后迅速轉變爲一個亞洲主義者，并在在野政治家萱野長知（1873-1947，也是當時犬養的隨員之一）的授意下開始創建東方文化聯盟¹⁵⁾。

清水的第三次中國之行則是在聯盟成立之後，時間間隔也不如第一次和第二次之間那麼久，而是在第二次的五年之後。

按照《會誌》第五號所載：

九月二十六日、清水理事渡支 本聯盟理事として本日午前大阪駅出發朝鮮、満洲經由平津及上海へ出發した。¹⁶⁾

此處的9月26日是指1934年，也就是在聯盟成立兩年有餘，未滿三年之際。此次中國之行歷時一個多月，清水於11月初回到大阪，並於同月13日舉行了演講午餐會對聯盟成員發表此次考察之行的感想。

十一月十三日、清水理事講演午餐会 三十有餘日に亘りて満洲、北支、上海方面歴訪中であつた清水理事が十一月三日に帰朝したるを以て前回に佐多理事より豫告した通り取り敢へず同氏の觀察感想談を聴く爲めに午餐会を開催した、約一時間に亘る熱辯で、少なからざる感興を喚起し公表を憚る部分は速記を中止して、忌憚なき見聞感想を披瀝したのには満堂の耳目を聳動させた。¹⁷⁾

此次演講午餐會共有92人出席，其中包括了聯盟理事佐多愛彦、栗本勇之助和平川清風，以及戶田芳助、留日記者鮑振青等人。而清水在演講午餐會上的發言最終整理成爲“滿支視察歸朝談”一文，刊載於《會誌》第五號上¹⁸⁾。

14) 同注13。

15) 關於清水此次中國之行的過程及其思想的轉變，詳見陶德民《內藤湖南と東方文化聯盟—昭和初期におけるアジア主義の一形態》一文。

16) 《東方文化聯盟會誌》（第五號、1934年）、115頁。

17) 同注16、118頁。

18) 清水銀藏《滿支視察歸朝談》（《東方文化聯盟會誌》第五號、1934年）、82-98頁。

二 1934年中國之行的背景和原因

在開始討論清水銀藏此次中國之行前，筆者認為有必要簡要介紹一下當時的時代背景，因為這和清水的此次中國之行息息相關。1931（昭和6）年9月18日，聯盟成立的三個月前，爆發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日本進占中國東三省，並於次年3月建立了“偽滿洲國”。這場突如其來的事變給清水等一部分秉持早期亞洲主義和平協調路線的亞洲主義者以強烈的衝擊和震撼。

1930（昭和5）年《倫敦海軍條約》簽訂後，由於該條約相對此前的《華盛頓海軍條約》（1922年）更進一步限制了日本海軍的發展，引起部分基層海軍官兵的強烈不滿，興起推翻政府的風潮與運動¹⁹⁾。這項運動與日本陸軍內部的秘密組織“櫻會”²⁰⁾的宗旨不謀而合。此外這些海軍軍官還和日蓮宗的井上日召（1886-1967）及由井上所帶領的血盟團²¹⁾合作，他們認同井上“昭和復興”的看法，並認為“剷除”政府首腦與財閥人物是有其必要的。而時任首相犬養毅主張在“九·一八”事變後緩和與中國的關係，提倡日中友好，並派遣萱野長知為特使，與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進行和談，此舉遭到了井上和森格（1883-1932）等右翼分子的嫉恨。1932（昭和7）年5月15日，在經過秘密謀劃後，以三上卓（1905-1971）為首的一群海軍青年軍官發動了“五·一五”事件，犬養毅在首相官邸被槍擊身亡。這一事件對日本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此後海軍大將齋藤實上臺組閣，標志著近代日本政黨政治的終結。

犬養作為清水的導師和摯友，自清水從政以來就對他一直多有提攜，更加是他亞洲主義道路上的領路人，因此犬養的去世絕對是對清水的沉重打擊。在犬養去世兩年多後的1934（昭和9）年6月26日，內藤湖南也與世長辭。內藤作為聯盟的“精神領袖”，對聯盟和清水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短短兩年間，犬養和內藤兩個對清水產生重要影響的人相繼去世，清水正是在這種不幸事件接踵而來的情況下開展聯盟的事業活動。

清水在聯盟成立之後“遺憾的是到今天為止還沒有和中國主要人士握手交談的機會”，不過在日中兩國簽訂停戰條約之後，劍拔弩張的氣氛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緩和，給清水前往中國打下了基礎。而真正的契機則是與時任民國政府駐日公使蔣作賓（1884-1941）有關。蔣作賓早年曾官費赴日留學，先後就讀於東京成城學校和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期間作為初始成員參與創建同盟會，也正是因為早年的留日經歷讓他多年後可以擔任駐日公使一職。

昨年支那公使蔣作賓君が東京に帰られましたから早速お目にかかって東方文化聯盟の存在のことを申し上げたのでありますが、併し公使にこの話を致した丈では相済まぬのでどうしても機会があれば一度上海を中心として支那の要人に会って話をして置きたい、かう考へたのであります。つい機会を得ず今日まで荏苒として日を送って居りましたが、幸に僅かの時間を得ましたので参つて来た

19) 這一風潮的最終結果就是1930年11月14日的濱口雄幸首相被刺事件，這直接導致了立憲民政黨濱口內閣倒臺，此後立憲政友會犬養毅接替濱口上臺組閣。濱口本人於1931年8月26日因細菌感染去世。

20) 1930年成立的超國家主義極右翼團體，以日本軍事化和翼贊會體制為宗旨。其成員多為陸軍大學出身並在軍部任職的年輕軍官。核心成員有橋本欣五郎、坂田義郎和樋口季一郎等。

21) 血盟團事件是1932年2月至3月期間發生的多起政治暗殺事件的統稱。在井上日召的帶領下，極右翼激進分子暗殺了前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和三井財閥的領導者團琢磨等人。此後血盟團並未銷聲匿跡，還參與了“五·一五”事件。

次第で御座います。²²⁾

可見，清水此次中國之行并非是在內藤去世后臨時起意，而是至少在1933年就已經有了初步的想法，清水趁著蔣作賓回日之機向他介紹了聯盟的存在，並構思計劃以上海為中心的中國旅行。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1933（昭和8）年12月10日刊行的《會誌》第三號扉頁上，印有蔣作賓所題“光被四表”四字，在蔣作賓題字後還有同為時任駐日公使江洪傑所題“忠信篤敬”。“光被四表”出自《尚書·堯典》中的“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意為盛德善行遠播四方。從中可以看出蔣作賓對聯盟的事業有相當高的評價。

三 1934年中國之行的過程

1934（昭和9）年9月26日清水從大阪出發後，第一站先抵達了朝鮮半島的京城府（現韓國首爾市），並且與十餘名親日朝鮮人及在朝日本人舉行會談。這次會面給了清水將聯盟介紹給朝鮮重要人士的機會。鑒於聯盟理事和評議員中並沒有朝鮮人士的身影，因此可以說此次會面對聯盟在朝鮮打開知名度和獲得發展事業的機會極有幫助。

離開朝鮮後，清水經由奉天（現遼寧省瀋陽市）抵達滿洲國首都新京（現吉林省長春市），並與時任滿洲國國務總理鄭孝胥（1860-1938）會面。此次會面有一個前奏，那就是1933（昭和8）年內藤湖南訪問滿洲國時，曾向鄭孝胥和文教部總務司司長西山政豬等人表達了對東方文化聯盟與滿洲國新成立的日滿文化協會之間展開合作的期待²³⁾。而清水和鄭氏會面時，重申了此時已經去世的內藤的想法，即日滿文化協會和東方文化聯盟之間需要更多地開展合作。鄭氏作為當時日滿文化協會的會長，對合作事宜頗為爽快，兩人最終也達成了合作協議。

清水在“滿支視察歸朝談”一文中多次提及自己對雙方能夠達成合作一事感到很高興，並且還將此事專門向聯盟成員進行彙報，可見促成聯盟和日滿文化協會合作一事對清水而言是一件值得大書特書的事情，也是聯盟在華發展過程的中的一大業績。換一個角度來說，1933年新晋成立的日滿文化協會在伊始就聚集了大批文人，在滿洲文化事業中具有很大的影響力。而能夠將日滿文化協會作為聯盟進入滿洲地區的“敲門磚”，可以說對聯盟在滿洲開展活動有極大的助益。因此不難理解清水的興奮之情。

在鄭孝胥處獲得重要成果後，清水經由大連抵達平津地區。在平津，清水共滯留了4天（10月15-18日），在“公使館若杉參事、清水通譯以及朝日、每日兩社支局長的大力斡旋下，與相當多的中國人會面”，可以說這是清水真正意義上第一次和中國的政界、文化界人士進行直接交流。

在平津期間，與清水會面的重要人士有政治家湯爾和（1878-1940）、政治家黃郛（1880-1936）、北平市市長袁良（1882-1952）、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1886-1964）、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胡適（1891-1962）、

22) 同注18、83頁。

23) 內藤湖南本人就是日滿文化協會的重要成員，擔任協會理事和評議員之職。現關西大學內藤湖南文庫還收有大量內藤和日滿文化協會之間的往來信件。對兩方合作一事，除內藤湖南、鄭孝胥和西山政豬外，頗為著力者還有岡部長景和水野梅曉等人。

金城銀行²⁴ 總經理周作民（1884-1955）、大公報社長胡霖（1889-1949）和北平晨報社長陳博生（1891-1957）等人。其中湯爾和和黃郛兩人都是日本通，早年都曾留學日本。黃郛作為蔣介石的結拜兄弟，在國民黨擔任過諸多要職，並於1933年5月主導簽訂了《塘沽協定》。而湯爾和早年留學日本學醫期間，就結識了聯盟理事佐多愛彥，因此清水和湯爾和的會面實際上是依託了佐多的私人關係才得以達成。

清水和湯爾和有如下對話：

私にこの湯爾和先生がかういふことをいったのであります、満洲國の獨立に、相當に日本は力を入れて居る様であります、併し三千萬民衆の中で少くとも二千五百萬人は皆、湖北、山東に家がある、兄弟がある、親かあると云ふ支那人であります、山海關を一步向うに行けば満洲人である、山海關のこちらに来れば支那人であります相當にお氣をつけなさい、と云ふ事を私共に實は言はれたのであります。²⁵

湯爾和關於山海關內外的一番話道出了一個事實，那就是雖然“九·一八”事變將東三省從中國分裂出去，變成了滿洲國。但是地理上的隔絕無法切斷血脈上的聯繫，不論中國人還是滿洲人血管裏都是流淌著同樣的血液，這是永遠也無法隔絕的。

在與清水會面的諸位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來自北大的兩位，蔣夢麟和胡適是清水此次中國之行見過的人中唯二的文化界人士。而清水和他們之間也因立場和觀點的不同，發生了尖銳的交鋒。

蔣夢麟作為北大歷史上任職時間最長的校長，是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是新教育思想的傳播者，更是重要的領導者、力行者，對於規範和提升中國近代教育作了許多劃時代的貢獻。在主政北大的20餘年間，一直秉持其師杜威（1859-1952）的“教育本質論”和“教育平民主義”等思想，並長期堅持“相容並包、思想自由”的方針。

胡適和蔣夢麟同樣師從杜威，但是卻和蔣夢麟的路子不太一樣，胡適更多地繼承了杜威的哲學思想。因此在對日本的態度上，胡適比蔣夢麟要更加激進一些，僅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後的1932到1933年間，胡適針對日本所發表的文章就有不少，如“論對日外交方針”“全國震驚以後”“中國問題的一個診察”“日本人應該醒醒了”等等。在這些文章中，堅持國家統一、反對侵略和強調東北三省不可分割是胡適一貫的原則。以“日本人應該醒醒了”一文為例，胡適在文中說道：“即令日本的暴力更推進一步乃至千萬步，即令日本在半年一年之內侵略到整個的華北，即令推進到全海岸線，甚至於深入到長江流域的內地—我們還可以斷言：中國民族還是不會屈服的。中國民族排日仇日的心理只有一日深似一日，一天高似一天。中日問題的解決只有越離越遠的”²⁶。顯而易見，上述表達的是對日本野蠻侵略的憤慨和對中華民族抗戰的信心。

在會面中，清水認為東方文化聯盟為了謀求東方諸民族的互相理解和親和，特別是在文化層面通過兩

24) 金城銀行成立於1917年，總部設於天津，是近代中國重要的中資私營銀行之一，與鹽業銀行、中南銀行、大陸銀行並稱“北四行”。

25) 同注18、88-89頁。

26) 胡適《日本人應該醒醒了》（《獨立評論》第四十二號、1933年）。

國國民的相互理解來謀求互相之間的親和團結，這必然會產生一個“國民外交”的結果，並將聯盟的宗旨分發給在場諸位閱覽，在場的諸位也進行了毫無顧忌地討論，清水和蔣氏、胡適之間還進行了激烈的爭論。總體上而言，與會眾人一致認同清水的觀點和聯盟的宗旨，即便是身為政治人物的黃郛和袁良也沒有表示反對，這是一件很難得的事。可見，不僅是文化界，在政界中也同樣有不少人反對戰爭，希望能夠以和平的方式來解決兩國爭端，促進兩國之間的親善友好。

清水提出在謀求日中間真正親善的道路上，存在兩個“腫瘤”。第一個是在“九·一八”事變後，日本投入大量時間和金錢建設滿洲地區，並為此作出了巨大的犧牲。但是從實際的結果而言，日本究竟從滿洲獲得了多少利益，而日本和滿洲的關係又何去何從？在不解決滿洲問題的前提下就去和中國談所謂的“親善”，這樣真的可以麼？第二個則是在滿洲問題上，日本政府一直都在使用各種小伎倆來做一些妨礙中國統一的事情，那不斷地做這種事情又如何能夠達成真正的日中親善呢？不解決滿洲問題，又如何使兩國攜手共同解決整個東洋的問題呢？

以上這兩點都是針對“九·一八”事變後的日中關係中的致命點，也就是滿洲問題。雖然在事變後兩國關係逐漸回歸平緩，但是日本政府鯨吞中國的計畫一旦開始施行且嘗到甜頭後，就很難再停止下來。事實上從“九·一八”事變到後來“七·七”事變的6年間，日本一天也沒放下其侵略中國的計畫。

在清水表達完上述觀點之後，蔣夢麟和胡適似乎並不十分滿意，其中蔣氏直截了當地詢問清水對滿洲問題有何看法。面對質詢，清水的回應如下：

日本帝国政府の方針は決して支那の統一を妨げる方針はとって居らぬ、支那の統一こそ希へ、これを分裂に導くなんて断じて左様なことはないのである、申忘れましたが蔣夢麟は滿洲問題とこの支那を分裂に導くといふことについても非常に激昂した調子で私に打つかったのでありますから（中略）日本が支那を分裂に導くなどはない、我々は一体支那の統一こそ日本の利益ではないか、支那が分裂して居るといふことは日本に不利益ではないか（中略）中国の統一こそ希へ支那の分裂は日本の不利益である、支那は左様な不安状態にあるといふことは日本の不利益である、日本の国民は決して分裂を願っては居ない、日本政府は決して分裂を希っては居らぬのであるといつて、相当に自分共の肚を話合つて、日本を見直さない。²⁷⁾

清水認為解決滿洲問題是實現中日兩國之間真正親善的前提，也是進而解決整個東亞問題的基礎，但是當時的大環境卻沒有提供解決此問題的條件。而作為他個人以及整個東方文化聯盟，一直以來都是支持中國的統一，也不會做有損於中國統一的事情。何況一個分裂且長期處於不穩定狀態的中國不一定符合日本的利益，反而統一且穩定的中國才符合日本的利益。雖然日本佔領了滿洲，但是實際上日本國民並不希望看到中國分裂。因此希望蔣夢麟和胡適應該拋棄之前的成見，重新審視日本。

清水的這段論述仍是針對他的“腫瘤論”，還進一步提出瞭解決滿洲問題是日中兩國實現親善前提的論點，但是他同時也認為當前的大環境並不具備解決滿洲問題的條件，只有靜觀其變。實際上作為當時的中國人來說，不對日本抱有成見是幾乎不可能的事，畢竟三年前才丟掉了東三省。但是作為蔣胡這樣的文化

27) 同注18、86-87頁。

界重要人士，也確實應該站在相對理想和客觀的角度來看待兩國關係，而不是帶著有色眼鏡去看待中日關係。

蔣胡二人皆認同應該重新審視日本的觀點。蔣夢麟對清水關於滿洲問題的回應頗為受用，而胡適則不甚滿意，並將話題引向了日本國內的政黨政治，胡適認為日本的政黨政治在當時已經遭到了破壞，不再具備其應有的機能。對此清水有不同的看法。其認為如果說日本的政黨政治已經具有完備的體制並進入衰退期而遭到破壞的話，那確實是很悲觀的。但是實際上，當前日本的政黨政治體制並不完備，也就不能稱之為真正意義上的“政黨政治”，因此也就沒有遭到破壞一說。雖然現在日本還沒有政黨政治，但是當前正是一個機遇。經過長期的戰爭，日本的立憲政治在10年至15年前就應該通過政黨來運作，但是實際上一直以來都是官僚政治，而披著政黨政治外衣的官僚政治並不是真的政黨政治。官僚政治和政黨政治之間的衝突矛盾是日本百弊的根源，很多人說的黨弊，其實並非是政黨政治的弊端，而是在官僚政治之上進行政黨政治形成的矛盾衝突，這就是日本的百弊之源。

在滿洲事變發生後，給真正的政黨政治的誕生提供了機會，而在原本的環境下，因為舊習的存在，政黨政治的改革是很困難的。滿洲事變後，日本國內對政黨的譴責、不信任之聲不絕於耳，這就給了政黨重新改變的機會。雖然已經有了軍國主義和優勝主義的苗頭，但是先行者花費數十年才建立起來的政黨政治是不會被摧毀的，因為其已經深植於日本國民心中。

綜上所述，清水和蔣胡等人的交談是十分具有意義的。對於沒有留日經歷的人來說，可以通過清水瞭解到日本人對待中國的不同觀點，即不同於侵略，而是和平、親善的觀點。這一點對他們重新審視日本無疑是有幫助的，可以避免一種“一棒子打死”的偏頗。而對於清水來說，蔣胡兩人的觀點無疑是一種刺激。通過瞭解中國人、特別是重要人士對日本的想法，可以讓清水更加深刻認識到開展“文化親善運動”的意義和重要性以及東方文化聯盟開展事業的必要性。

清水在上述表達的觀點中，雖然對當時的日本感到絕望，但是對政黨政治仍懷有信心，也希望可以將這種觀點傳達給東亞其他國家的人民。可惜的是，清水的這種信心並未成為現實。在清水去世兩個多月後，發生了“七·七”事變，日中戰爭全面爆發，清水的期望終歸不能得到實現。

離開平津後，清水經由南京到達上海。在上海，清水會見了東亞同文書院院長大內暢三（1874-1944）、日本駐華公使有吉明（1867-1937）、日本在華紡織同業會總務理事船津辰一郎（1873-1947）、中國銀行總經理張公權（1889-1979）、浙江財閥李銘（1887-1966）和上海市長吳鐵城（1888-1953）等人。

在上海，清水遇到了和在平津完全不同的境遇。有吉明和船津似乎並不歡迎清水的到來，“平津地區因滿洲的關係以及最近的種種事情，兩國間的關係比較緩和，但是上海還沉迷於上海事件（“一·二八”事變）中。特別是帶著日中友好，謀求亞洲民族融合的目的來上海，上海人根本就不會聽”。實際上，由於上海在近代中國的重要經濟地位，自從亞洲主義興起後，上海就一直是日本亞洲主義者在中國活動的一大中心。而自從日本逐漸在東亞確立霸權，成為東亞盟主之後，日本右翼分子大量湧入上海，使得經受“一·二八”事變後的上海更加反感所謂的“日中親善”。對於此種情況，兩人給了清水“你的旨意書如果不加以說明的話，會讓人難以理解。所以你要不要和上海人士見見面，喝點酒再回去呢”的建議。

清水在聽取兩人的建議後，認為雖然此次中國之行的主要目的地不是上海，但是上海作為中國的經濟中心，和日本的大阪剛好相對應。而聯盟又是依託大阪工商界組建的亞洲主義團體，這正是一個開展國民外交的好時機。以此為動力，在公使館的牽線搭橋下，清水成功與當時上海金融界的大佬張公權、李銘以

及上海市長吳鐵城進行了會面。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與吳鐵城的會面。清水與吳鐵城共有過兩次會面。

吳鐵城和黃郛、湯爾和一樣早年留學日本，對日本瞭解頗深。在“七·七”事變之前，吳氏和北平的湯爾和相似，對日本都較為妥協。在“一·二八”事變發生後，吳氏聽從蔣介石之命，以私人身份多方拜見，促成《淞滬停戰協定》的簽訂。事實上，在清水此次中國之行會見的人中，吳氏是對清水態度最好、最客氣的一位。

兩人間第一次會面在吳氏的辦公室，清水面對吳鐵城有如下表述：

実は御承知の通り既にパリーの平和會議に於て平等權の獲得を召んだ日本であるのであります、この平等と云ふことは即ち申す迄も無く白人優越權の解消を意味する、白人優越權の解消はこれを叫ぶ日本が白人に代って亜細亞民族として優越權を行はうなどと云ふ考へは持って居らん、吾々はどうしても同じ兄弟として手を握って共々にこの大問題を解決したいと云ふ考へを持って居るのであります、決して白人に代って亜細亞の盟主となり亜細亞の号令する等と左様な要もなければ、又左様な僭越な考へも持って居らない又日本が独力をもって、この東洋問題の解決を為し得る等とそんな自惚も持って居らんのであります。(中略)私共はこの東洋問題は解決しないと思ふ、甚だ僭越ではありますけれども東方文化聯盟は其大仕事の一助にも相成らんかと実は平和的に殊に經濟上に相当の東洋の天地に關係の深い大阪の地を選んで、かやうた企を致して居るのである、申す迄も無く、政府と政府との外交ではなくて國民外交の一端を果すものとして、この聯盟が存在して居るのでありますから、其意味合に於て我が聯盟は進んで居ると、かう私は吳鐵城に申したのであります、この時王長春君(吳鐵城秘書一筆者注)も吳鐵城君も非常に慎重なる態度でまア聞いて居りました。²⁸⁾

清水在和吳氏的會面中提到了此前沒有提到的白人優越權問題。清水認為自巴黎和會之後，東亞的白人優越權土崩瓦解，白人優越權的消解意味著需要有新的國家亦或是民族站出來成為東亞的領袖。但是這個領袖並不是很多人認為的日本，而應該是由日本和中國來共同擔任，因為單靠日本一國之力是無法解決東亞問題的。日中之間不能親善的原因很多時候是因為兩國都沒有意識到要攜手才能解決東亞的問題，聯盟的成立就是以此為己任，開展國民外交，讓更多的人認識到兩國必須聯合、親善。

不過兩人的第一次會面效果似乎並不好，吳氏和其秘書王長春(清水和吳氏會面時，王氏也在場)都對清水的話持很慎重的態度，這可能和自“一·二八”事變後上海持續高漲的反日情緒有關。

在與吳氏第一次會面結束後，清水還想多在上海逗留幾日，但是無奈必須要在10月29日乘坐長崎丸號返回日本，因為需要參加11月3日在岡山舉行的犬養毅銅像揭幕儀式。吳氏在得知此事後，特意安排10月31日鹿島丸號在上海停靠，送清水返日。29日吳氏在自宅宴請清水，進行了兩小時左右的交流，與會者還有張竹平、汪伯奇等人。在這次會面中，清水除了重申第一次會面時的觀點外，還著重介紹了聯盟的事業。在此次會面結束後，清水明顯感覺到吳氏的態度已經由第一次會面時的“慎重”變為“充滿好感”。而對於這樣的轉變，清水表現得甚為得意。

28) 同注18、90-91頁。

清水在結束上海的考察後，於10月31從上海返程，11月3日抵達神戶。回顧此次中國之行，清水認為雖然自己作為東方文化聯盟的理事，沒有為聯盟募集會員，也沒有設立支部，甚至還在各地受到了很多質詢。但是此行的收穫是巨大的，那就是向中國介紹了東方文化聯盟這個組織，也為今後聯盟的事業進入中國開拓了道路。此次中國之行讓上海市民、北京大學生、亦或者其他城市的市民學生，乃至於整個中國四億人民都有機會認識到東方文化聯盟，這就是最大的成果。當然，對清水而言，同樣有遺憾的事。在抵達上海後，有吉明曾詢問清水是否有時間抽一日前往南京和汪精衛進行單獨會面，但陰差陽錯下最終未能成行。這也成為清水此次中國之行最為遺憾的一件事。

四 清水銀藏の感想

清水認為東亞最大的問題只有一個，那就是中國到底是統一還是分裂，除此之外的其他問題都不甚重要。實際上在當時，對於這個問題有許多不同的觀點。有相當多的人認為中國是部分統一的，也有很多人認為中國是統一的。不過有一點需要明確的就是，一個統一的中國是符合日本利益的，因此我們必須懷著希望乃至於支持中國統一的立場才行。

清水不論是在平津還是在江浙地區，從接觸的日本人處得到的訊息基本都是蔣介石想要統一中國是很困難的，日本應該大力聯絡華北地區和西南地區的勢力，以此來牽制蔣介石政府。清水覺得日本政府乃至於日本國民的對華方針都是一貫的，那就是支持中國的統一，但是部分強權機構的部分人卻一直幹著分裂中國的事。在這種情況下，又如何可以叫“日中親善”呢，不論廣田弘毅外相和有吉明大使如何努力去外交，都不會有結果。

從政治角度來說，犬養毅曾對清水說“我們的使命，日本的真正使命就是握緊中國四億人民的手來共同解決東洋的問題，這就是我們的使命，也必須是日本的一大事業”。雖然犬養這麼說，實際上日本從來沒有這麼做過。但是在面對歐美的入侵時，單靠日本獨木難支，只有兩國聯合才能夠抵禦。日本在面對美國、英國乃至俄國時都遭遇過失敗，現在的日滿關係就如日英同盟重現一般，於日本的生存權毫無益處。想要確立日本百年、千年乃至萬年生存權的唯一途徑就是聯合中國，解決東亞的問題。

從經濟角度來說，日本產品很難進入英國本土，而印度市場還處於開拓階段。如果將來和美國戰端一開，也不能再進入美國。如果真的是這樣，那中國就是日本產品最大的海外市場，從這一點來說一個分裂的中國是不利於日本的。清水得出這一結論源於他在奉天、天津及上海的所見所聞。

從外交角度來說，清水前往日本駐華公使館時，發現外務省的外交方針在實際執行時完全是另一個樣子。外務省的外交方針本是單純且一貫，但是到了下面卻變成複雜且和中國政府相折沖。因此日本的這兩種方針，到底哪一個才是真的？這樣的情況下，日本的外交真的可以成功嗎？清水是在帶著這種疑問的情況下回到了日本。

在文章的結尾，清水還特地提到蔣介石對三民主義進行重新解釋一事。並提出自蔣介石重新解釋三民主義以來，曲阜孔廟愈發興旺起來，而部分滿洲人也以此來作為滿洲王道主義的反映。這一點值得關注。

小結

1934（昭和9）年9月26日從大阪出發直至11月3日歸國，在歷時一月有餘的考察中，清水銀藏與當時不少中國政界、金融界、新聞界以及文化界人士會面，可謂收穫不小。雖然此行有些許遺憾，但仍不失為一次成功的宣傳、交流之旅。筆者認為要討論清水此次中國之行的收穫以及影響，需要從兩個方面來說，即對東方文化聯盟這個組織和對清水銀藏個人。

首先是對東方文化聯盟。雖然清水並未趁著此次考察之機為聯盟招攬會員和設置支部，但是畢竟東方文化聯盟之名是實實在在地宣傳開了，這對於聯盟來說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清水在滿洲促成了聯盟與日滿文化協會間的合作，並得到鄭孝胥等人的支持。鑒於日滿文化協會在滿洲地區的影響力，這對聯盟在滿洲地區開展事業大有助益。在平津和上海，清水也將聯盟的宗旨和事業介紹給了政界、文化界、金融界和新聞界的重要人士。平津作為當時中國的文化中心，文人學者具雲集於此，為清水傳播聯盟的亞洲主義思想提供了很好的氛圍。上海作為當時中國的經濟中心，清水也為大阪工商界聯結上海工商界牽線搭橋，為聯盟中的工商業者進入中國提供了契機和便利。

實際上，除清水此次中國之行外，聯盟成員在同年還有兩次類似的視察活動。第一次是2月，聯盟派遣戶田芳助和印度人薩海參加在大連舉行的亞洲民族大會準備會議，並在會議結束後視察了奉天和新京等地²⁹⁾。而第二次則是和清水同時期的10月上中旬，聯盟理事、大阪朝日新聞東亞部長神尾茂（1883-1946）偕同同社主編高原操（1875-1946）前往北平做了一次飛行訪問。不過此次訪問並非是以聯盟的名義，而是大阪朝日新聞社為紀念歐洲飛行訪問十周年做的紀念活動。關於此次北平飛行訪問的詳情和感想，神尾和高原二人也就平津方面的對日動向以及滿洲機構設置等問題作了彙報³⁰⁾。總體上而言，清水銀藏的此次中國之行是聯盟核心成員第一次對中國進行大規模、長時間的全面考察，也是第一次將聯盟介紹給中國的各界人士，真正意義上為聯盟進入滿洲乃至於中國打開了大門。因此把此次中國之行稱之為對聯盟具有開創性意義的旅行也毫不為過。

其次是對清水銀藏個人。從1932年至1934年的短短兩年間，清水的精神導師犬養毅和聯盟的精神領袖內藤湖南相繼去世，自此領導聯盟的重擔就全部壓到了清水的身上。因此此次中國之行對清水而言，有一種為聯盟尋找未來發展方向的意義。雖然聯盟自成立以來就盡量規避政治對聯盟事業的干擾，但是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想要完全不涉及政治層面是不現實的。因此就可以看到清水與鄭孝胥的會面、聯盟與日滿文化協會的合作等等。

在中國視察期間，清水從駐北平和上海的使領館探聽到不少一線消息，如日本實際上的對華政策等。其中特別需要注意的是關於日本打算以中國為基地，將來在亞太地區對美開戰的訊息。事實上，在同年12月29日，日本宣佈退出《華盛頓海軍條約》和《倫敦海軍條約》，正式開始不受束縛地大力發展海軍。而日本海軍在亞太地區的對手是誰，那是不言自明的。雖然日美關係不在聯盟的事業範圍內，但是如若日美開戰，那日本勢必會需要中國的“幫助”。因此從這一點來說，就更加凸顯聯盟開展“文化親善運動”的重要

29) 關於此次視察感想，詳見黎仙生（戶田芳助）《緬想事象錄》（《東方文化聯盟會誌》第四號、1934年）、72-78頁。

30) 關於二人之感想，詳見神尾茂《北平訪問飛行と最近支那の印象》（《東方文化聯盟會誌》第五號、1934年）、63-71頁。

高原操《滿洲視察より歸りて》（《東方文化聯盟會誌》第五號、1934年）、71-80頁。

性。

綜上所述，清水銀藏此次中國之行無疑是成功、具有開創性的，不僅僅在於為聯盟打開了進入滿洲和中國的大門，還在於為將來聯盟的發展方向奠定了基礎。不過同時也必須看到，雖然清水的亞洲主義思想繼承自犬養毅和內藤湖南，且有很強的持續性，但不可忽視的是清水不過是立憲政友會的地方幹部，從未有過在中央政府任職的經歷，兼且聯盟的活動中心在遠離東京的大阪，這就導致清水很難掌握日本政府高層乃至於軍部的真正想法。這種情況在犬養毅和內藤湖南去世後更為顯著，聯盟主要成員中多為工商界和新聞界人士，沒有一個和政府高層有密切往來的人，也就很難第一時間掌握日本對外政策的走向。因此從這一點來說，聯盟另闢蹊徑遠離政治中心，且以工商界人士為主，這是一柄雙刃劍，在給聯盟帶來特點和優勢的同時，也有一定的局限性。而清水個人的亞洲主義思想，在30年代還能夠秉持早期亞洲主義的和平協調思想，是一件難能可貴的事。但是也不能就此否認，他的部分觀點太過於樂觀和理想化。

隨著時間的推進，日中間的關係並未如清水當時所論斷的那般向越來越好的方向發展。特別是在1936（昭和11）年日中兩國接連發生了對後世產生深遠影響的大事件。2月26日，日本爆發“二·二六”事件，和前述“五·一五”事件由海軍發動略有不同的是，“二·二六”事件是“皇道派”和“統制派”的“內部鬥爭”。該事件的結果就是日本軍部權力大增，徹底走向軍國主義道路。12月12日，中國爆發“西安事變”，在張學良、楊虎城等人的脅迫下，蔣介石政府被迫由先前的對日妥協轉為暫時的“停止內戰、聯共抗日”。這兩件事情造成的後果就是日中間的矛盾在日本軍部逐漸掌權後不斷激化，隨著日本國內軍國主義和擴張主義熱情的不斷高漲，戰爭已經到了不可避免的地步。1937（昭和12）年“七·七”事變的爆發，代表著早期亞洲主義的最後一點生存空間也消亡殆盡，東方文化聯盟的活動也在這之後逐漸沉寂。清水銀藏也在“七·七”事變爆發前兩個多月去世，或許對於他來說，沒有親眼看見日中戰爭的全面爆發應該是一件幸事。

